

# 鸟声中醒来

傅菲

两只鸟儿在叫,天露出光。叫得冷清,婉转。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,也不知道鸟儿叫什么。细细听鸟声,似乎很亲切,像是说:“天亮了,看见光了,快来看吧。”露台湿湿,沾满露水。路对面的枣树婆婆,枝桠伸到了露台上。青绿的枣叶密密,枣花白细细地缀在枝节上。枣树旁边的枇杷树,满树的枇杷,橙黄。几只鸟儿在枇杷树上跳来跳去。鸟儿小巧,机灵,腹部黄绿色,上体淡淡暗红色,喙短而叫。鸟儿叫的时候,把头扬起来,抖动着翅膀。

房子在山边。山上长满了灌木、杉木和芒草。路在山下弯来弯去,绕山垄。乌桕树在房子右边,高大壮硕,树冠如盖。冠盖有一半,盖在小溪上。小溪侧边是一块田。田多年无人耕种,长了很多酸模、车前草、一年蓬和狗尾草。田里有积水,成了烂水田。这里是蛤蟆、青蛙、田蛙和泥鳅的乐园。还有两株野长的芋头,芋叶像一把蒲扇,青蛙蹲在芋叶上,不时弹出舌苔,黏吃蛾蝇。蛙多,蛇也会来。蛇是乌梢蛇,溜溜游动。

鸟叫声,越来越多,越来越喧闹。有好几类鸟在叫。有的鸟儿离开树,飞到窗台上,飞到围墙上的花盆上,飞到晾衣杆上。光从天上漏下来,稀稀薄薄。空气湿润,在栏杆在竹杈在树桠在尼龙绳上,不断地凝结成露水。露水圆润,挂在附着物上,慢慢变大变圆,滴在地上。露珠润物,也润心。看见露珠,人便安静下来,便觉得世间,没什么事值得自己烦躁,也更加尊重自己的肉身。很少人会在意一颗露珠,甚至感觉不到露珠的存在。只有露水打湿了额头,打湿了裤脚,才猛然发觉,露水深重湿人衣,再次归来鬓斑白。露是即将凋谢的水之花。它的凋零似乎在说:浮尘人世,各自珍重。

每天早上,我听到鸟声,便起床,也不看几点。时钟失去意义,我没有日期的概念,也不知道星期几,也不关心星期几,也不问几点钟。我所关心的日期,是节气。节气是一年轮转的驿站:马匹要安顿,码头上

的船要出发。其实,早起,我也无事可做。即使无事可做,坐在露台上,或在小路上走走,人都舒爽。清晨的鸟叫声,成了我的闹钟,急切地催促我起床。

光慢慢变得白亮。我下楼,到鱼池里看鱼。这鱼池是在小溪边建的,放养了二十几条鱼,有锦鲤、鲫鱼、翘嘴白,还有半斤白虾。早晚我都要看一次鱼池,我喜欢看鱼在池里游来游去。池边长了矮小的地衣蕨和水苔。地衣蕨有两片叶,像女孩子头上翘起来的头发辫。我不喂食,养了半年多,鱼也不见长。三月份以后,鱼少了好几条。我不明白,鱼怎么会少了。出水口入水口用铁丝栅栏封了,鱼游不出去。有一次,在半夜,我听到两只猫吱吱地打架,乌桕树的树叶沙沙作响。我明白了,鱼是让山猫吃了。山猫爱吃鱼。

路上,陆陆续续有人,光线有了润红。墙上多了红晕和人影。人影斜长,淡黑,在移动。地上也有了影子,树的影子草的影子狗的影子鸭子的影子。我去菜地摘四季豆青辣椒,做早餐下粥菜。粥是红薯小米粥,我常吃不厌。四季豆,我们也叫五月豆,细朵的白花,绕上竹杆的藤,阴绿的叶子,看上去心生喜爱。摘四季豆,豆叶上露水扑簌簌落下来,衣襟湿了一片,凉飕飕。竹杆上停了好几只红蜻蜓,我摇摇竹杆,它们也不飞,黄绿的眼睛在溜溜转动。也可能翅膀露水湿重,飞不起来。

有开着挖掘机的人来了,绕进山里。据说有人在山垄里,种铁皮石斛和灵芝。我去了几次山垄,没看到人。山垄不大,遍地是茂盛的苦竹和矮灌木,鸟特别多。有人在山垄里架起网,网鸟。相思鸟、苇莺、黄腹蓝鹁,都被网到过。我也不知道是谁架的网,我看见一次,把网推倒一次,把竹竿扔进灌木林里。

其实,我是一个喜欢赖床的人。但每次听到鸟叫声,我会立即起床。不起床,似乎辜负了鸟声。鸟声是我生活中,唯一的音乐

了。我不能辜负,不可以辜负。

每一个早晨,我都觉得无比美好。山还是那座山,乌桕树还是那棵乌桕树,但每天早晨看它们,都不一样。每天遇见的露水也不一样。在露水里,我们会和美好的事物相逢,即使是短暂的。诗人海子在《房屋》中写道:“你在早上/碰落的第一滴露水/肯定和你的爱人有关/你在中午饮马/在一枝青桠下稍立片刻/也和她有关/你在暮色中/坐在屋子里不动/也是与她有关……”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在山中生活之后,我慢慢放下了很多东西,其实,人世也没那么多东西需要去追逐。很多美好的东西,也无需去追逐,比如明月和鸟声。风吹风的,雪落雪的,花开花的,叶黄叶的,水流水的。人最终需要返璞归真,赤脚着地,雨湿脸庞。



# “刘老师”

简平

1993年9月,我去《城市导报》报到那一天,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诗人刘希涛,我叫了他一声“刘老师”,这一叫就持续到了今天。

那时,刘老师是副刊部主任,而我在新闻部工作,又当记者,又做编辑。不过,有空的时候我会去副刊部与刘老师聊天,因为我同样是个爱好文学的人。刘老师一聊起文学来,就神采飞扬,很有感染力。不曾想没有多久,我便调到了副刊部,成了刘老师的手下。《城市导报》的文艺副刊名叫“长街”,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非常美妙的刊名,蕴含了许多的诗意,应该是符合刘老师的审美的,所以,后来改称“不夜城”时,我和刘老师一样的不屑。之后有一段时间,刘老师请了创作假,我就一个人把副刊给扛了下来,不过,刘老师还是经常会指导我,并给我组来一些稿子。有一年的中秋节,刘老师约我和另一位同事去他家赏月,他诗兴大发,在清疏的月色下给我们朗诵了他的名作《康定老街》。我一边听一边想,刘老师天生便是个诗人。

刘老师一生都钟情于文学,他是将文学、将诗歌当作生命的,所以,他是如此执著,执著得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些傻。比如,他当兵退伍后被分配去了电影院,那是一份很轻松的活,又是干部编制,可为了写出富有时代和生活气息的诗歌,他傻到硬是要求去钢铁厂做了一名炼钢工人,不过,熊熊的炉火真的炼就了一位“钢铁诗人”。又比如,他退休后明明可以游山玩水,但他傻到不好好享清福,依旧日日为文学而操劳。他办过《上海诗人》,现在又办着《上海诗书画》,他的家就是编辑部,他将组稿、编辑、排版、印刷等事情全包了,还把夫人也拖下了水,将一张张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报纸叠起来,放进信封,一一写上地址、姓名、邮政编码,再贴上邮票,寄往四面八方。他不仅为此花费心力精力,还贴补了不少财力。这几年,他又组织起了海口文学社,不断策划各种文学活动,心心念念地想方设法给社员们出书,如今“海口诗文库”已经出版了180多种,制造了如诗般的美丽文景。正因为这样,我觉得刘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如果说,这个世间有一群因痴迷文学而一生都活得生机勃勃、充满理想、诗意和创造力的人,那刘老师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。

前些天,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作家分会成立,我和刘老师一起被任命为副主席。我望着旁边和我一样穿着格子衬衫的刘老师,一瞬间有些恍惚。他今年虚岁75岁,而我比他晚生了14年,两个月前才刚刚退休,我可自以没有他的“壮心不已”。但是,为了文学和真善美的传承,他是那么精神矍铄,我怎么可以不提振士气呢?以后我与刘老师又要在一起工作了,25年之后,我们再次成为了“同事”。当然,他还是我的老师,我还是愿意做他的手下。

也是在那天,刘老师跟我提起了一件往事。他说,那个去他家赏月的中秋节我是带了一瓶白酒去的,但他一直舍不得喝,藏了好多年,结果最后打开来的时候发现,里面的酒已挥发得不剩一滴,可他却将酒瓶保存至今。我听了很感动,刘老师真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。

# 半日游

张艺腾

这里是仿紫禁城按比例缩小的一个景点,正在举办园游会。进了检票口就是贩卖纪念品的商店,一长溜专柜摊位,摆的是全国所有景点都在贩卖的商品,没多少人在柜台前停留,真正有意思的是庙会里那些传统艺人的杂耍,还有特色小吃。但不远有一个“一元兑换处”,拥挤着不少人。

这个“一元兑换处”,只要是持有门票的人,再加一元钱就可以获得一个小礼品,如果肯加的钱多,会有更好的东西。加一元给的是一个葫芦形状的小挂坠,加二十元给的是貔貅摆件。我们图个热闹,也兑换了一元挂坠。兑换时人们差不多都要问这个小挂坠是什么材质的,营业员说是翡翠的,价值五十元一个,于是人们欢天喜地地拿走了。当然我们并不真的相信。

人堆之外五六米的地方,有一家三口安静地往这边观望,却不上前。这一家三口衣着朴素,两个大人穿着已褪色的老旧制服,走热了,敞着怀,露出里面的粗线毛衣和毛衣下面的衬衣领口,孩子穿的是黄色

制服,上衣是黄的,长裤也是黄的,相同的布料,一看就是套装,很合身,应该是新做的,扣子扣得严严实实,看上去有点像门童。这家人一看就是有意穿着整齐才出来,可见是把游园看成了一个很正规的活动,但这样的穿着看上去有点像服务人员。

那穿黄制服的孩子是个少女,十二三岁的样子,父母三四十岁,但都显得老,而且个头很矮,女孩比他们还高。她手里拿着三张票,跟我们一样是那种免费的赠票。一家三口隔着人群迟疑地看了会儿柜台里忙着兑换的售货员,仍然没有上前,收起票根退开了。

他们拔腿走的时候,我看到那父亲腿脚不便。穿黄制服

的少女一瘸一拐,腿脚比父亲还不便,女儿别扭且倔强地走着,他们三个并成一排走了。

从“一元兑换处”出来后,我们去了园游会的主会场。看着那一家三口走的方向,估计是奔着大佛去了,他们要进那个殿堂,那里能许愿。去年园游会时我去过那里,里面有三层楼高的大佛,还有壁画,还有经书,也有虔诚的信徒在绕着大佛转。

我们看够了杂耍,离开园游会的场地,要去城墙上走走。走在半道我发觉刚才用门票兑换的葫芦形状的挂坠不见了,想必是在看杂耍或是看蘸糖人时掉了的,我没想回去找,因为知道这东西不值钱。

沿着城墙走,越走越安静,

渐渐到了后城。这里有高级宾馆、康体中心、高尔夫球场,我希望找到停机坪,因为相传这里的老板有直升飞机,平时就停在这里。如果能看到直升飞机,那这次就来得有意义,比看杂耍和大佛好玩。

我说我想去找找看直升机,爸爸说既然都来了,就多转转,当锻炼身体了。这段路可不近,很可惜转来转去根本没有停机坪的迹象。只看到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,被晒得很黑,让我想起那穿制服少女的父母也是这样黑。

真是个悠闲的下午,虽然很累。等我们再从城墙上走回来,庙会快散场了,大批量的游客已经散了。忽然又想起那一家三口,不想竟然又见到了,就在我们前面十几米。那穿制服少女走路有些不自然,可能也太累了。我看到她手里依旧拿着三张门票,也许是不舍得保留作纪念。

我们走得比他们快,离得更近时,我看到穿制服少女的手腕上多了那个“一元兑换处”的吊坠。